

期刊·观察

# 认识多彩的端午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端午节连着“六·一”儿童节,这大概是节日密度最高的小长假了。而端午的节日信息密度,亦充分勾勒了其多彩的面貌。

端午节的多彩,从名称即可感受到。“端”有“初始”之意,是仲夏的开端,盛夏的起始,而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于是便有了“端午”之称。由此衍生出许多别名,常见的有端阳、端五、五月五、重五、重午、仲夏节、五月节、天中节等。此外还有以标志民俗事项作为代称的菖蒲节、龙舟节、浴兰节、女儿节、粽子节、屈原日等。之所以有这么多名称,就因为端午背后蕴含丰富的节日习俗。

端午节最深入人心的习俗,莫过于“划龙舟”“吃粽子”。“划龙舟”是中国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它以龙形或饰有龙纹的船进行水面竞赛,又称“赛龙舟”。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们多以五月为赛龙舟的具体时间。但《文史知识》杂志刊文说,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赛龙舟”绝非仅限于五月,亦有二月春日举行的。文章从唐宋诗词中找到了具体的例证,表明唐代“赛龙舟”存有“二月中”和“五月初五”两个时间;到了宋代,赛龙舟更为盛行,每年例行两次,一次在农历二月初八。另一次在五月初五。

至于“吃粽子”一项,如今粽子

的“面孔”就更多了:以“馅料”分类,除了一般的咸肉粽、碱水粽、豆沙粽、红枣粽,还有佛跳墙海鲜粽、金华火腿鱼干贝香菇虾米粽等,花式翻新;以“形状”分类,多数是三角锥形,其他还有数十种形状:牛角粽、枕形粽、马蹄粽、竹筒粽、鸭母粽……《壹读》杂志的盘点是:三角粽是绝对主流;若是将三角粽拉长,使其变得更细长、尖锐一些,就是牛角粽,看起来恰如一只尖尖的牛角,

在广东河源、湖南汨罗常见牛角粽的身影;还有一些粽子几乎完全“跳”出了三角粽的“外形框架”,比如云南的竹筒粽,以金竹、香竹等新鲜竹节做容器,用宽大的蕉叶、粽叶封口,整个粽子呈现圆柱状。山东日照、青岛等地的板桥粽“粽如其名”,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方体板桥,每个角都近似直角……

从民俗学角度看,“划龙舟”“吃粽子”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庆仪式。《书城》杂志刊文解读,从破浪的龙舟和投水的粽子都与潮水波涛有关,反映了南方先民开创新文明之时,依存于水又与水搏斗的经历;划龙舟

显示人类的聪明才智,人们利用自然,把自然界原生态的木材改造成舟楫,以龙形姿态出现,驾驭龙舟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与洪波巨浪共存,不卑不亢,弄潮戏水。粽子则是用南方农耕稻作的果实制成的食品。稻依靠水的浇灌滋养,才能结实收获,形成果腹的粮食。制成粽子后以酬神或厌胜的方式投入水域,作为敬重自然神祇的献祭,也满足了蛟龙或水族的饕餮食欲,以期盼上苍的保佑,为人世带来平安与安宁。

粽子、龙舟作为端午核心符号也传入了贵州。贵州的粽子同样千姿百态:布依族的乌灰粽藏着草木灰的奥秘,苗家的枕头粽丈量着节气的长度,贞丰的羊角粽在煎锅

里发出诱人的脆响;贵州苗族称端午节为“龙船节”,龙舟造型独特,采用“母子船”形式,即一大两小的龙舟并排竞技,象征团结与力量,同时纪念传说中斩杀恶龙的英雄故亚。贵州在端午节期间还会举行赛马、斗牛、踩鼓舞等活动,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出嫁的女儿需带鸡鸭、粽子回娘家探亲。

此外,贵州的端午节,还有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习俗:“游百病”。据说端午这天百草都是药,出门游玩是把身上的病气游掉,一年到头百病全消。这也应了“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的俗语。

由此可见,贵州少数民族的端午习俗是“活着的历史”,也丰富了端午节的民族内涵。

## ■文史期刊

### 走进神秘的西夏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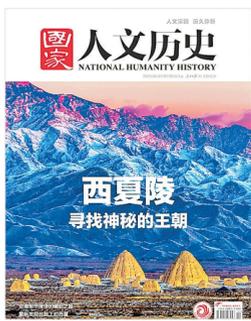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上,半月刊

从地图上看,横亘在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的贺兰山,是分隔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贺兰山以西是广袤的荒漠戈壁,以东是中国西部最耀眼的“塞上江南”。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党项、蒙古等诸多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在贺兰山地区活动。隋唐交替之际,党项族从一个寂寂无闻的游牧部落崭露头角,在唐末乱世中崛起。1038年,党项族李元昊称帝立国,建立西夏王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并与宋、辽、金等王朝鼎足而立,其统治区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然而,在二十四史中,这个存续189年的政权却没有一席之地,其所创造的历史逐渐掩埋在西北黄沙之中。随着黑水城、西夏陵以及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西夏国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通过走进神秘的西夏陵还原西夏。

秦汉以来,在“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影响下,无论是平民还是帝王,建造与自身地位相称的陵墓成为必需。作为统治一方的帝王,其陵墓的选择和修建,被看作关乎国运的大事。

西夏政权建立后定都于贺兰山麓的宁夏银川,西夏陵也坐落于贺兰山脚下。这些陵寝在西夏灭亡后损毁严重,但20世纪以来的考古依然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对于确定陵墓主人身份和研究西夏历史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如今,西夏陵区中尚存9座王陵,以及王公贵戚的陪葬墓200余座。

西夏陵总体布局是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明人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载:“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固,东南以河为险。黄河襟带东南,贺兰踞峙西北。背山面河,四塞险固。西据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韩兆民、李志清两位先生在《宁夏银川西夏陵区调查简报》中写道:



“从王陵墓区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是依山面河,互为形势。这反映了西夏王陵墓区的择地,深受唐宋山陵葬仪及风水堪舆的影响。”党项族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唐宋文化,在陵墓选址中,西夏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原王朝帝陵选址的传统,另一方面沿袭自身民族传统中的丧葬文化,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兼容并蓄、具有特色鲜明的西夏陵制。

历史上的西夏,不仅是有着重装骑兵“铁鹞子”与冷锻“瘠子甲”的尚武之邦,更深谙崇儒重教的治国之道。统治者一方面以党项语为根基,模仿汉字,创制出形符篆的西夏文字;另一方面又“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尊孔子为文宣帝,创办太学,大兴科举。西夏的科技工艺同样绽放异彩,苏峪口烧制的瓷器媲美景德镇的薄胎瓷;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木活字版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分别将我国掌握活字“二元配方”技术和木活字印刷历史的时间刻度前移。《天盛律令》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法典,内容涵盖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军事法等各个领域,极大丰富和完善了中华法系的体例和内容。将八角圆楼式与覆钵式两种造型合二为一的宏佛塔、壁画里的秃发童子飞天以及西夏与金朝榷场贸易的文件,都生动诠释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 “加油文化”中的李端棻与王伯群

《文史天地》2025年6月号,月刊

“加油”是地道的汉语词汇,含有助威、鼓励之意。传到海外,被牛津字典收入并直译为“add oil”。“加油”两字最早出自贵州且带着一股桐油味,近两百年间竟薪火相传,拓展为“加油文化”。近两年来,《文史天地》杂志开辟“加油文化”专栏,对“加油文化”的知识谱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事情得从180多年前“知府添油”劝学的故事说起。清道光、咸丰年间,贵州兴义府(府治所在地即今黔西南州安龙县)知府张毓十分重视教育,每天深夜便派两个差役,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挑着桐油篓,见谁家亮着灯光传出读书声,便在门前高唱一声:“府台给相公添油。”读书人开门后,差役便舀出桐油,倒进读书人的灯盏。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张毓共在安龙任职14年。其间,他坚持每晚给读书人添油,鼓励学子用功读书。巴掌大的安龙,短时间内走出了20多个举人、两名进士。

按照“加油文化”专栏的梳理,如果说张毓是“加油文化”的“开先河者”,那么张之洞、鹿传霖、刘官礼等则属于第二代传承人,严修则属于第三代传承人中的重要一员,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属于第四代传承人。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就李端棻、王伯群二人与“加油文化”的关联进行了梳理。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蕊园,贵州贵阳人。我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首倡者、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贵州新式教育的领路人。其与“加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李端棻和“加油文化”第二代传承人张之洞是同乡、同科进士、同事;两人均出生于贵阳,均在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进士,一起在翰林院共事三年,两人志趣相投,均主张教育兴国;其次,同为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李端棻携手



张之洞在教育领域贡献良多。“加油文化”第三代传承人严修,由张之洞、李端棻共同推荐保举出任贵州学政。在黔期间,他将古书院改革为经世学堂,引入西方科技,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如雷廷珍、姚华、徐天叙等,且这些学者后来成为又一代知识分子,如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1915年组织参与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名播天下。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王伯群一生跨越“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王伯群在当时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的状况下,单枪匹马,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是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王伯群以“服务国家,日公曰诚”之精神,屡经创业之艰、发展之难、播迁之困而永不放弃。

## ■文学期刊

### 气候危机背景下的文学关怀

《世界文学》2025年第3期,双月刊

中国古代讲究的“风、水”,在现代科学背景下指的是地球两大循环系统:大气循环和水循环。两者的正常流转,对地球生态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则是生态的灾难。现实是,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自然灾害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造成的破坏愈发严重。最新一期《世界文学》杂志推出“复响的警报:气候危机”专题,通过刊发若干篇以气候危机为主题的小说、短剧和随笔,为气候危机添上一份文学关怀。

俄罗斯作家维塔利·希格利斯基的小说《主人公在写什么》描写了温室效应下体表的闷热和内心的烦闷。英国作家凯南·琼斯的小说《博博》围绕暴雨引发的漏危机,讲述了一个威尔士乡村家庭经受极端天气考验的故事。巴拿马作家埃拉·乌里奥拉的小说《早》以饱含辛酸的笔触描述了农村贫困家庭在旱灾期间面临的生存绝境。巴西作家保里妮·道特的小说《飞河》同样将堪比末世光景的天灾与神秘莫测的天意相联系,作者有意拉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受灾处境。荷兰作家马尔滕·厄哈特的《四月的仲夏》讲述了一位生物学家在提早到来的春天里见到的反常现象以及经历的心理变化。法国作家达尼埃尔·马蒂尼厄尔在小说《小秃毛兔》里巧设谜局和悬念,将读者探索的目光一路引向暗藏在山洞里的核设施。墨西哥作家安德烈娅·查佩拉的小说《如人听雨》展示了墨西哥城因长时



间强降雨而没人水中,当地居民或举家外逃或临水而居的末世景象。澳大利亚剧作家埃尔斯佩丝·蒂莉的短剧《等待离开》利用两名演员手里的“停”字路牌按下人类快速前进的脚步,引导读者从人物的诗性独白和戏谑控诉里寻找自己与消费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经济共谋的“罪证”。

本专题还收录了三篇与气候危机以及次生灾害相关的纪实文章。在《端倪》一文中,印度作家乌尔瓦希·布列塔基基于自身感知写出了21世纪初印度气候的变化趋势。在《斯里兰卡海啸》一文里,美国人类学者约翰·博恩曼以双重视角——既作为深陷漩涡的亲历者,又作为抽身审视的观察者,记述了人类个体直面自然暴力的生死瞬间。澳大利亚作家丽贝卡·吉格斯的《墨鱼》描写了动物忍受高温烘烤的痛苦,以及无法诉诸语言的沉默。

这些作品,是作家以纪实或想象之笔来描述自己处在气候变化最前沿的生命感受,揭示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与每个生命体之间的关联。

### 探讨记忆与创作的关系

《上海文学》2025年6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上海文学》期刊刊发作家林秀赫的中篇小说《记忆深处》,同时刊发张鹏禹、赵松、顾文艳、张怡微四位评论者的短评文章,探讨记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

“海马体”是脑科学术语,在大脑中担当着关于记忆以及空间定位的作用。小说前半部分讲述的是女主“记忆挖掘”的过程,挖掘的动机是文学创作:记忆是手段,创作才是目的。到了后半部分,情节开始反转:记忆中心通过技术提取了女主藏在深处的记忆,发现她此前主动挖掘的记忆全是虚构。《记忆深处》通过讲一个在记忆深处迷失的女作家追忆真实、寻找自我的故事,探讨关于一个人如何成为作家的故事。即文学创作是记忆的复刻,作家是复刻、支配和虚构记忆的人。作者在“导论:文学与记忆”为小标题的第一节里开宗明义:“就医学角度来说,文学是一种‘记忆之学’,是记忆的艺术表现,文学活动是一种对于记忆的阅读与创造,包括梦,都是记忆的产物。梦是由无意识创作的文学。可以说,每部文学作品,都是记忆的复刻之作,无一例外。”

记忆与小说一样,总是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切换步伐。而如何用小说来处理记忆就更显得困难重重,但同时也让人迷恋。为林秀赫的《记忆深处》写短评的四位评论者,从不同的维度靠近这部作品,靠近作者本人。张鹏禹说,《记忆深处》用密集的心理知识列举了自我与记忆的多种关系,而自我与记忆的



关系,就像作者与作品,“这无异于说,记忆本身是叙事性的,正是在‘叙事’这一点上,自我与记忆、作者与作品形成了同构”。赵松将《记忆深处》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文学名著《追忆逝水年华》相比较:“如果说普鲁斯特的小说艺术源自对记忆、时间与事物灵光闪现式的触发关系,以及回忆的重构属性的全新认知,那么林秀赫在《记忆深处》所展现的小说方式,则是基于对大脑的某种异常状态导致的记忆结构乃至人格状态发生裂变的想象。”顾文艳的观感是,“每个人都在私人的文学素材(记忆)里苦苦探索、挣扎,奋力精进。其他人是竞争对手,但实际上每个人又只能跟自己较劲”。张怡微则回忆了《记忆深处》中林秀赫的点点滴滴。这些言论共同回应了小说创作的本质问题——小说如何叙写记忆的形状,又如何时光的长廊里安放自我和世界。

## ■博物期刊

### 草原上的草与老鼠

《博物》2025年6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博物》杂志推出“草原新牧歌”特别策划,着重介绍草原的生态系统,以及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最重要的两端:草与老鼠。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鸟儿唱,一碧万顷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耳熟能详的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唱出了草原上美丽的景象。草原是人与自然关系格外密切的生态系统,绿草鲜花不只是美景,也牵系着牧民的衣食住行。在茫茫辽阔的大草原上,草永远是是最重要的存在。以草本为主的各类草原植物,被蒙古族牧民所熟知并深爱,牧民用它们为女孩取名,为它们谱写歌曲。每一株植物、每一种动物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独特密码。

草原上的鼠类,一度被视为草场退化标志的物种。但在蒙古族牧民眼中,老鼠对草原的生态系统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老鼠通常会选择草比较稀疏、地面比较秃的地方打洞。鼠洞多了,增加了土壤的渗透性,避免了草原上常见的“水过地皮湿”,同时鼠洞里老鼠粪便、老鼠储存的草和草籽,会使草场变得繁茂。与此同时,科学调查发现,在草原上鼠类至少出现在十几种动物的食谱中,比如多种猛禽、狐狸、鼬类等。因此,草原上的牧民对这件事一直很清楚:老鼠不但养活了大量飞禽走兽,而且对草场本身也有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总之,草原人认识身边各种动植物,有自成体系的博物学知识,在他们的认知中不存在哪种草好、哪种草坏,哪个动物好、哪个动物坏,因为贴近大自然的每个人,每个生态要素都是有用的,不可或缺。牧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在艰苦环境中的生存智慧,至今仍在草原上代代相传。